

CEO 金融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张梦昊

甘肃政法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以 2014—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 CEO 金融背景是否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 金融背景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机制检验发现，CEO 金融背景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效应在企业规模大和高科技企业中更为突出。因此，企业应该关注并运用 CEO 金融背景在减少数字化转型阻碍、增强数字化转型动力的积极作用，突破自身数字化转型难的困境。

关键词：CEO 金融背景；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烙印理论

DOI：10.69979/3029-2700.25.04.006

引言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达到 50.2 万亿元的规模，数字经济结构得到优化，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数据生产要素价值进一步释放。由此可见，数字经济赋能传统经济形态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事实，而数字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实体经济的数智化。数字经济中，新兴技术是亮点，数字化转型是重点，实体企业是主战场^[1]。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创新过程，通过重塑企业愿景、战略、组织结构、流程、能力和文化，以适应高度变化的数字环境^[2]。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企业内外部的增益效果均已得到证实^[3]。从企业内部影响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赵宸宇等，2021）^[4]和企业创新（温湖炜等，2022）^[5]，甚至能够明显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肖红军等，2021）^[6]和企业 ESG 表现（Lu 等，2023）^[7]；从企业外部来看，学者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于审计收费（张永坤等，2021）^[8]、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陶峰等，2023）^[9]与资本市场信息环境（Chen 等，2022）^[10]等方面溢出效应。综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如何从企业内外部寻找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因素成为企业和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重点关注技术层面和动力层面的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比如，数字技术发展及渗透（MATT 等，2015）^[11]、生产技术能力

（金珺等，2020）^[12]等技术因素均能够推动企业配备与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有效克服企业因数字技术匮乏而转型能力不够的问题。然而，目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却面临着转变进程缓慢、两极分化严重的现实问题，仅靠技术因素无法解决企业因转型阵痛期较长而“不敢转”和因转型成本偏高而“不愿转”和的制约和阻碍^[13]，企业数字化转型仍需强大的动力和资源支持^[14]。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学、心理学在管理学中的应用，高管的功能性背景在近几年逐渐得到学者的重视，也有研究从企业内部角度出发将管理层特质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探讨不同类型的管理层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比如，汤萱等（2022）^[15]探讨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高管团队教育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和海外背景异质性能够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但由于高管团队中不同成员的职能和权限不同，对企业的影响力也不同，笼统地站在高管团队整体的视角加剧了个体差异导致的研究噪声问题，造成结论的不准确性^[16]。CEO 作为企业高管的一员，对企业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高管团队的特征，因此从 CEO 特征的角度出发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可行性。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CEO 复合职能背景（毛聚等 2022）^[17]与 CEO 信息技术背景（刘锡禄等 2023）^[18]均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但鲜有文献将 CEO 金融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 2014—2022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 CEO 金融背景的视角出发，分析 CEO 金融背景是否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难以数字化转

型的压力、提高企业数字化的意愿。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聚焦于 CEO 金融背景探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促进作用，不仅弥补了 CEO 金融背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空白，还拓宽了高管不同背景尤其是金融背景的研究；第二，CEO 金融背景能够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发现，为企业尤其是大规模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内部战略团队利用情境因素缓解数字化转型压力、减少“不敢转”“不愿转”的阻碍、提高自身数字化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CEO 金融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往往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数字技术的嵌入和生产流程的重构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组织内部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难以找到数字技术服务与业务场景的融合点和组织不同部门存在利益壁垒导致协同困难等问题^[19]，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往往需要较长的“阵痛期”，企业也会由此产生“不敢转”的担忧；其次，数字化转型需要组建的重大科技设施和创新平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担负巨大的资金压力，存在“不愿转”的难题。本文认为，CEO 金融背景会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减少企业融资约束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成为实现根本性的数字创新以及广泛系统效应的“数字颠覆者”。

一方面，CEO 金融背景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从而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敢转”的问题。高阶梯队理论指出^[20]，高管会由于自身年龄、性别、价值观等因素的不同做出差异化的战略选择，烙印理论则进一步从高管不同特质产生的源头对高管和组织行为的相互作用做出说明，即个体在成长、学习或工作的过程中会存在“敏感期”，在这一特殊期间的经历会给个体留下印记，这种印记将伴随个人的职业生涯产生持续性的影响（Mathias 等，2015）^[21]。根据产生的时期不同，烙印又被分为技能型烙印、经验性烙印和制度性烙印三个类别^[22]。CEO 金融背景正是产生于 CEO 在金融机构工作时期的经验性烙印，CEO 在此阶段大量的信息处理和学习使得自身产生了与金融工作相关的印记。首先，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要面对和处理海量的信息，精确地抓住机会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往往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机会筛选能力和资本运作能

力^[23]，从而能够更为准确的识别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提高数字资源配置效率，找到数字智能与业务流程融合的切入点，因而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度，有效缩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阵痛期”；再者，CEO 的金融背景会提升 CEO 项目投资的风险偏好，在具有高风险特点的金融行业任职过的 CEO 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大但收益可观的数字化转型项目进行投资，从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管理者的风险控制能力是企业承担风险的前提^[24]，金融行业具有高风险、高压力的特点，在此行业工作的 CEO 也具备了较高的抗压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这使得 CEO 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要面临的风险性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和强大的承受力。因此，CEO 金融背景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效克服了企业因担心转型过于复杂、“阵痛期”过长而“不敢转”的障碍。

另一方面，CEO 金融背景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减少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愿转”的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大范围应用数字技术、大规模投资智能制造以及在企业内部搭建现代化信息系统，因此需要很大程度的资金支持，当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而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时，往往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基本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放弃或终止成本高、风险大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对此，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可以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第一，金融从业背景为 CEO 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可以更容易地获取有用的信息，并且相关工作经历能够使 CEO 认识到对方的需求和要求，有效缓解企业与融资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减少了融资约束；第二，已有研究表明管理层承担风险意愿较强，有利于企业把握盈利机会，并向外界传达企业成长性和盈利性的信号（Runyan 等，2008）^[25]，因此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可以通过向外界传递正向信号从而提高投资者对企业发展的信心，降低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融资的难度。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 H1 假设：

H1：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验证 H1 中 CEO 金融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设计如下(1)模型：

$$\begin{aligned} \text{Dig}_{i,t} = & \alpha_0 + \beta_1 \text{CEOFB}_{i,t} + \sum \gamma \text{Control}_{i,t} + \\ & \text{Year} + \text{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end{aligned}$$

其中: $Digi_i, t$ 为被解释变量, 代表企业 i 在 t 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CEOFB_{i,t}$ 为解释变量, 代表企业 i 在 t 年的 CEO 的金融背景情况; $Control$ 代表控制变量; ϵ 为模型随机误差项; $Year$ 和 $Industry$ 代表控制的时间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

解释变量: CEO 金融背景 ($CEOFB$)。CEO 金融背景是指 CEO 曾在政策性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期货公司、投资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及其他金融

类公司的工作经历。同时设定虚拟变量: 如果 CEO 具有金融背景记为 1, 否则记为 0。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特征词年报中出现的频次通常表示企业经营战略中对数字化转型的应用情况和重视程度。因此, 本文借鉴吴非等 (2021)^[26]的研究, 使用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云计算以及大数据方面的关键词在年报中的词频之和, 加 1 并取自然对数, 代表上市公司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表 1 变量测量

类型	名称	符号	测量方式
因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	年报中有关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之和, 加 1 并取自然对数
自变量	CEO 金融背景	CEOFB	若 CEO 具有金融背景取值为 1, 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上市年龄	Age	上市公司年龄
	企业成长性	Growth	用销售收入增长率表示
	企业盈利能力	Roa	用资产收益率表示
	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占比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
	监事会规模	Supervisor	监事会人数
	高管人数	Senior	高管人数
	CEO 年龄	Ceoage	CEO 年龄
	CEO 性别	Gender	CEO 性别为男取值为 1, 否则为 0
	CEO 海外背景	Oversea	若 CEO 具有海外背景取值为 1, 否则为 0
	CEO 学术背景	Academic	若 CEO 具有高校任教、科研机构任职或协会从事研究经历取值为 1, 否则为 0

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4—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同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①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样本; ②剔除收 ST、ST*、PT 处理的样本; ③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 1% 和 99% 处的缩尾处理, 最终得到 2555 家上市公司的 10878 个观测值。

2.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g	10878	1.770	1.609	1.495	0.000	5.159
CEOFB	10878	0.055	0.000	0.228	0.000	1.000
Size	10878	22.550	22.350	1.290	19.990	26.360
Age	10878	10.520	9.000	6.880	1.000	27.000
Growth	10878	0.335	0.147	0.782	-0.714	6.220
Roa	10878	0.033	0.036	0.067	-0.312	0.196
Indep	10878	37.620	36.360	5.371	33.330	57.140
Board	10878	8.512	9.000	1.616	5.000	14.000
Supervisor	10878	3.469	3.000	0.957	3.000	7.000
Senior	10878	6.649	6.000	2.408	2.000	14.000
Ceoage	10878	50.130	51.000	6.424	33.000	66.000
Gender	10878	0.942	1.000	0.234	0.000	1.000
Oversea	10878	0.116	0.000	0.321	0.000	1.000
Academic	10878	0.234	0.000	0.423	0.000	1.000

表 2 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CEO 金融背景 $CEOFB$ 的均值为 0.055, 标准差为 0.228, 说明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只有全样本的 5.5%, 不同企业间 CEO 是否具有金融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 的均值为 1.770, 标准差为 1.495,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5.159, 表明从整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并不深, 并且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差异很大。

3 实证分析

3.1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中列 (1) 至列 (3) 为模型 (1) 的回归结果, 其中列 (2) 加入了控制变量, 列 (3) 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固定了行业效应和时间效应。可以看出, 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 CEOFB 的系数分别为 0.191 和 0.159, 均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控制行业和时间效应后 CEOFB 的系数为 0.122, 同样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 CEO 金融背景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假设 H1 得到了支持。

表 4 多元回归结果

	(1) Dig	(2) Dig	(3) Dig
CEOFB	0.191*** (3.04)	0.159*** (2.59)	0.122** (2.50)
Controls		yes	yes
Constant	1.759*** (119.40)	1.056*** (3.42)	-1.654*** (-6.03)
Adj-R2	0.001	0.053	0.493
Industry	no	no	yes
Year	no	no	yes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和 *** 依次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后表同。

3.2 异质性分析

前文结果表明, CEO 金融背景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那么这一作用在不同情境下是否会显著不同? 本文分别探讨 CEO 金融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不同企业规模和企业科技水平下的异质性。

1. 企业规模异质性

企业规模越大, 意味着企业管理人员能够调动的社会网络资源越多, CEO 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信息处理来缓解信息不对称, 也可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为企业筛选较好的数字技术进行投资, 还能够承受风险较高的项目, 并且通过资本运作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以便控制风险。综上, 相较于规模小的企业, CEO 金融背景在规模大的企业里更能够发挥对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作用。本文按照企业规模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企业规模大和企业规模小两个子样本。表 5 列 (1) 展示了企业规模异质性的结果, CEOFB 在企业规模大的子样本中系数为 0.314, 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而企业规模小的子样本中系数不显著, 并且表明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 CEO 金融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提升作用在企业规模大的企业中更能够发挥作用。

2. 企业科技异质性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 动态动力是企业利用技术资源、组织资源和管理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 而高科技企业往往面临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较强的动态能力。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能够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把握投资机会, 从而增加企业的技术资源, 并且具有大量的人脉和社会网络资源, 能够为企业吸引和制造更多的组织资源。所以, 在高科技企业中, 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更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动态能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看出, 高科技企业中 CEOFB 系数为 0.207, 在 1% 的水平下正显著, 并且在 1% 的水平下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这说明在高科技企业中, CEO 金融背景更能够基于提升企业动态能力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表 5 异质性分析

	(1)		(2)	
	企业规模 大 Dig	企业规模 小 Dig	高科技企 业 Dig	非高科企 业 Dig
CEOFB	0.314*** (4.90)	-0.053 (-0.82)	0.207*** (3.43)	-0.056 (-0.7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929* (-1.78)	-3.717*** (-5.75)	-0.511*** (-14.88)	-0.511*** (-11.11)
Adj-R2	0.485	0.513	0.113	0.082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组间回归 系数差异 性检验	Chi2 (1) = 14.69		Chi2 (1) = 6.80	
	Prob > Chi2 = 0.000		Prob > Chi2 = 0.009	

3.3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上, 本文采用赵宸宇 (2021)^[4] 的做法, 通过文本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分别得出的分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各按 50% 的权重赋值, 最后计算出的总指数 Dig1 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如表 6 的列 (1) 显示, CEOFB 仍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结果稳健。

2. 更换模型

由于部分企业没有进行数字化转型或者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 企业尚未在财报中披露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内容, 导致样本中有 25.28% 的 Dig 值为 0, 数据呈现出明显的左归并特征, 因此适用 Tobit 模型。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6 列 (2) 所示, CEOFB 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3. 倾向得分匹配

具有不同金融背景的CEO所在的企业可能本身就存在偏差，因此本文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psm）来解决样本选择偏误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来说，以模型（1）中所有的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作为企业CEO是否具有金融背景的影响因素，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按照1:1最近邻匹配的方式进行得分匹配，最后使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各变量之间的差异基本不显著，匹配效果良好。匹配后的回归结果如表6列（3）所示，CEO_{FB}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去除样本选择偏误后的检验结果仍然稳健。

4. Heckman 两阶段模型

企业可能会由于某些原因而着重考虑CEO是否具有金融背景，从而导致企业选择具有金融背景的CEO的行为时存在非随机性。为了纠正样本自选择所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还选用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检验。首先，在第一阶段回归中构建Probit回归模型，并采用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用来探究上一期企业特征层面、治理层面和CEO个人特质层面的有关因素是否会影响下一期企业选择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在此基础上构建逆米尔斯比率（IMR）。然后，将IMR加入第二阶段回归的控制变量中，以克服样本自选择问题对本文结论的干扰。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如列（4）所示，IMR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在排除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偏差后，CEO_{FB}仍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6 稳健性检验

	更换变量	Tobit 模型	倾向得分匹配		Heckman 两阶段模型
			(1) Dig1	(2) Dig	
CEO _{FB}	4.822* (1.75)	0.170*** (2.89)	0.189*** (2.74)	0.001*** (2.6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IMR				0.482*** (182.89)	
Constant	-152.128** (-11.12)	-2.860*** (-7.14)	-4.022*** (-4.62)	0.142*** (8.72)	
Adj-R2	0.393		0.467	0.988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no	yes	yes	yes	

4 机制检验

4.1 CEO 金融背景、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数字化转型

本文参考李卓松（2018）^[27]的研究，使用企业对研发支出、资本支出和并购支出的总和取对数来衡量企业

风险承担水平。通过表7列（1）可以看出，CEO_{FB}和Risk的交乘项系数为0.102，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CEO金融背景的确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考察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具有合理性。

4.2 CEO 金融背景、融资约束与数字化转型

表7列（2）报告了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结果，CEO_{FB}和融资约束FC的交乘项的系数为-0.659，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CEO金融背景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不愿转”的阻碍，进而间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表7 机制检验

	(1) Dig	(2) Dig
CEO _{FB}	0.085* (1.72)	0.109** (2.25)
Risk	0.136*** (8.53)	
CEO _{FB} × Risk	0.102*** (3.03)	
FC		0.001 (0.01)
CEO _{FB} × FC		-0.659*** (-3.52)
Controls	yes	yes
Constant	-1.307*** (-4.69)	-1.667*** (-3.52)
Adj-R2	0.497	0.494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4—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究了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CEO金融背景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即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企业规模大和高科技企业，CEO金融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强烈；第三，机制检验发现，CEO金融背景能够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启示：一是企业在构建高层管理团队时，应该考虑高管以前的职业经历对高管的持续影响，尤其应该把握和利用CEO过往的职业经历对其产生的积极影响，继而对企业产生正向作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新常态重大议题的背景下，企业在

选择 CEO 时,要关注 CEO 金融背景在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缓解融资约束从而减少数字化转型阻碍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大规模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这种促进效应更应该被着重考虑;二是企业应全方位寻求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要素,在技术层面和外部动因的基础上,探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于激发数字化转型动力的效用。企业应深入挖掘高管团队成员的治理才能,培养数字化人才队伍,着力解决企业存在的“不敢转”、“不愿转”等问题,以全新的姿态拥抱数字化转型。

参考文献

- [1] 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改革,2019(4):137-148.
- [2] 童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3):124-128.
- [3] Kane G C, Palmer D, Phillips A N, et al. Strategy, not technology, driv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15.
- [4] 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财贸经济,2021,42(7):114-129.
- [5] 温湖炜,圣云.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22,43(4):66-74.
- [6] 肖红军,阳镇,刘美玉.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J].经济管理,2021,43(1): 52-69.
- [7] Lu Y, Xu C, Zhu B, et al. Digit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ES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3.
- [8] 张永坤,李小波,邢铭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J].审计研究,2021(3):62-71.
- [9] 陶锋,王欣然,徐扬,等.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2023(5):118-136.
- [10] Chen W, Zhang L, Jiang P, et al. C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Evidence from the analysts' prediction behaviour[J]. Accounting & Finance, 2022, 62(2): 2543-2578.
- [11] Matt C, Hess T, Benlian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J].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2015, 57: 339-343.
- [12] 金珺,李诗婧,黄亮彬.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J].创新科技,2020,20(6):22-34.
- [13] 唐浩丹,蒋殿春.数字并购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内涵、事实与经验[J].经济学家,2021(4):22-29.
- [14] 曾皓.税收激励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前瞻性有效税率的经验证据[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42(10):38-55.
- [15] 汤萱,高星,赵天齐,等.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中国软科学,2022(10):83-98.
- [16] 刘莉,扈文秀,王芳云.CEO 金融背景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J].企业经济,2022,41(7):149-160.
- [17] 毛聚,李杰,张博文.CEO 复合职能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42(9):37-58.
- [18] 刘锡禄,陈志军,马鹏程.信息技术背景 CEO 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中国软科学,2023(1):134-144.
- [19] Kalelkar R, Khan S. CEO financial background and audit pricing[J]. Accounting Horizons, 2016, 30(3): 325-339.
- [20] Hambrick D C, Fukutomi G D S. The seasons of a CEO's ten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4): 719-742.
- [21] Mathias B D, Williams D W, Smith A R. Entrepreneurial inception: The role of imprinting in entrepreneurial ac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5, 30(1): 11-28.
- [22] 张昆贤,陈晓蓉.谁在推动数字化?——一项基于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视角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42(10):68-87.
- [23] 杜勇,谢瑾,陈建英.CEO 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9(5):136-154.
- [24] 宋建波,文雯,王德宏.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17,38(12):111-126.
- [25] Runyan R, Droke C, Swinney J.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versus small business orientation: what are their relationships to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8, 46(4): 567-588.
- [26]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10.
- [27] 李卓松.企业风险承担、高管金融背景与债券融资成本[J].金融评论,2018,10(2):73-84+125.
- 作者简介:张梦昊(2000,3),女,汉,山东临沂人,硕士,甘肃政法大学,研究方向:公司治理